

移动传播时代:村民网络公共参与 对乡村社区认同的建构

——基于甘肃陇南F村的田野调查

牛耀红

内容提要:认同是社区整合及作为共同体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的乡村社区正在遭遇认同危机。公共参与是建构社区认同的重要因素,但是长期以来如何促进公共参与是城市和乡村社区共同的难题。尤其对我国广大西部地区农村而言,面对村庄流动性增强、空心化严重、公共精神缺失等问题,如何整合乡村社区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移动互联网为公众的公共参与提供了平台,媒介化参与已经成为了本研究田野点中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移动互联网公共平台构建了村民互动交往的网络公共空间,借助网络空间村民公共生活的复兴、村民公共参与书写乡村集体记忆、共同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均对建构新型乡村社区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公共参与;社区认同;移动传播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我国农村命运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正在面临人口流失、空心化、凋敝等多种问题困扰。农村未来何处去正在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尽管我国城市化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农村的消失还将继续,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农村对于我国社会的巨大价值。农村是我国粮食的重要生产基地,是我国承载人口的重要空间,是我国传统文化保存的重要场域。国家一直在推动乡村社区建设,虽然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却收效甚微。然而农民对乡村的认同才是他们留恋乡村社区,参与乡村建设的关键因素。可是,目前我国农民对乡村的认同正在面临危机。现代乡村向城市的急剧变迁使得人们犹如失去根基的“浮萍”

作者简介:牛耀红,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传播学、媒介人类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农村科技文化传播体系创新研究”(13BXW051)。

一般,迷失了方向。再加之信仰缺失、贫富分化扩大、社会不公正感增强,在制度缺位、道德滑坡、利益分化、社会流动加速的驱使下,社会结构出现“断裂”之势。(谢治菊,2012)我国农村在城市化发展潮流中,既有的社区整合逻辑被打碎,个人逐渐脱离共同体成为原子化的个人,经济利益原则主导下的个人功利化倾向使得农民公共意识逐渐淡漠,传统文化道德已经失去了约束作用,农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在减弱。在此情景下,人们注意到,传统乡村社区认同日益式微的当下,构建新型的乡村社区认同已经成为乡村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

学术界普遍认为,社区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提出。他将“由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称为共同体(Gemeinschaft)”,而“通过选择意志而形成并根本上被其决定的联合体称为社会(Gesellschaft)”(斐迪南·滕尼斯,1999:iii)滕尼斯指出,社区是“基于一定的地域边界、责任边界、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的情感关怀维系着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斐迪南·滕尼斯,1999:53)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农村社区的研究较多,但对农村社区认同的研究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散布于农村社区治理、乡村共同体重建、村落公共空间等研究主题中。项继权(2009)从历史维度分析了我国农村共同体的认同基础。他认为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乡绅在维护农村整合中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村进行了全面整合,集体化造就了行政干预认同的共同体,这类共同体具有极强封闭性;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民的职业、利益、观念多元化,农村逐渐走向开放,但是认同的基础却正在丧失,乡村共同体正在衰落。他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农村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重建之路。他认为,单纯的政治的组织和经济的联合并不足以形成真正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当前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之路,其中如何重建人们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是关键。他为农村共同体重建提出的对策是“走‘服务之路’,即通过‘服务’将分散的人们重新联系起来,在‘服务’的基础上重建社区认同。正因如此,只有强化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才可能真正增强农民对于所在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增强了农民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认同”。(项继权,2009:2-9)吴理财(2011)则从新农村社区建设层面分析了农村社区认同与农民行为逻辑的关系,提出了12个关于农村社区认同的命题,其中包括农村社区认同与社会资本、社区参与、行为规范、社区记忆、生产方式变化等维度。吴晓燕(2011)研究了村庄被改为社区后如何解决农民认同危机的问题,作者以成都市龙华社区的“新市民教育工程”为案例,探讨了如何通过以新居民为主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来重建其人生价值和意义以形成新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同。作者较为细致地分析了文化建设对于乡村社区认同建构的重要意义,值得借鉴。赵霞和杨筱柏(2013)探讨了当代中国乡村文化认同的理论外延与路径依赖。他们指出,当前乡村文化呈现出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对象也呈现出空置与虚化状态。重构乡村文化认同,就要做到对传统乡村文化精髓进行再认同,走传统本位的文化现代化道路;还要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法治精神,构筑乡村社会的公民文化认同;更要在无法回避的多元文化互动中,坚持乡村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树立文化宽容的价值观,最终实现文化自觉。纵观乡村社区认同研究,思辨研究较多,实证研究则较少。虽然一些学者指出了文化建设、公共服务对乡村社区认同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乡村社区建设实践表明,以行政主导的乡村社区建设较多关注基础设施建设,而对于如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及文化建设还有待继续探索。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村民网络公共参与下的乡村文化建设案例,这为研究乡村社区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背景与研究方法

2015年腾讯公司推出了“为村”公共平台,最初推出的公共平台基于微信公众号,实行中心化信息发布模式,实则为村两委班子提供了移动互联网发布平台。这类平台没有为村民提供参与入口,因此,虽然村庄微信公众号为乡村展示提供了平台,但依然是Web1.0时代产品。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无法参与的网络平台具有较大局限性。2016年,腾讯做出调整,推出了升级版“为村”公共平台。这一版本最大特点是为村民表达提供了通道。这个平台的两个重要板块是“广场”和“大喇叭”。广场定位于农村的网络公共空间,主要有“赶集”、“顺风车”、“村里好货”、“村庄美景”、“惠农广播”、“看电影”、“便民电话”、“网上订票”、“科普知识”等栏目。“广场”版块中“赶集”是村民参与度、活跃度最高的栏目,“赶集”栏目是村民网络交往的公共空间,该名称取自于乡村赶集,寓意村民可以在共同空间中交流互动。这个版块为村民提供了发布帖子的通道,操作方式类似于网络论坛。村民可以进行发布新闻、表达言论等操作。“为村”公共平台的“大喇叭”定位于村务治理,设有“村务公开”、“书记信箱”、“调查问卷”、“集资众筹”、“投劳投工”、“投票评选”、“活动报名”、“办事指南”、“农技指导”等栏目。这个版块主要为村庄治理提供支持和便利。这两个版块均为村民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2016年10月,“为村”公共平台进行了改版,增加了“精准扶贫”、“村内旅游”、“换届选举”等版块,但版块依然可以划分为供村民交往互动的“网络公共空间”以及为村两委班子提供便利的“村务治理平台”这两大类。对于乡村而言,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村民鲜有机会通过媒体进行表达。而“为村”平台则提供了村民自由表达的通道。那么当“为村”平台嵌入乡村后,村民的网络公共参与对乡村社区认同有何影响,这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线上民族志和实地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腾讯“为村”公共平台自2016年4月上线了村民可参与的升级版公共平台。此阶段上线的公共平台有贵州黎平铜关村、甘肃陇南花桥村、湖南湘西比耳村。笔者于5月18日开始关注甘肃陇南市康县长坝镇花桥村的“为村”平台,以线上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为村”公共平台,了解村民对移动互联网使用的观念和行为。7月,腾讯又开通了新一批“为村”公共平台。^①笔者开始进入新开通的公共平台,并申请注册为“认证村民”,最终有16个“为村”平台将笔者认证为“村民”。^②笔者对新开通的“为村”平台进行线上参与观察后,将甘肃陇南康县城关镇F村作为田野点,并于8月12日进入F村,进行为期35天的田野调查,11月6日再次进入F村进行田野调查。F村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城关镇,是西部山区的一个汉族村庄。F村距离康县县城4.5公里。全村农业户171户,人口581人。该村执行退耕还林政策后,多数农民不以种植业为生,青壮年劳力多外出打工,少量农户在村内经营农家客栈。

① 截至2016年11月20日,全国有2080个村庄申请“为村”,其中563个村庄审核通过,208个村庄建立了村庄公众号,71个村庄完成公众号开发并上线“为村”公共平台,45个村庄正在开发“为村”公共平台。数据由腾讯“为村”事业部提供。

② “为村”公共平台提供两种登陆方式。一种为“游客”登陆,“游客”可以参与“为村”平台中的非政务相关版块,比如可以在公共开放的“赶集”版块中发帖,但是无法参与“村务公开”、“书记信箱”等村务相关版块。另外一种是以“认证村民”方式参与“为村”平台,被认证的村民主要以本村村民为主,少量会认证县级领导、乡镇领导、农技专家、律师等人员,认证需要提交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这三类信息,管理员审核通过后,用户就具有了“认证村民”身份,可以参与“为村”平台中的所有版块。作者并非甘肃陇南康县F村人,经腾讯公益“为村”事业部负责人介绍,以第三方研究人员身份成为“认证村民”。

质性研究选取研究对象有多重维度,本文选择标准是典型性,即F村“为村”村民参与度全国最高、用户最积极、表现最活跃。笔者判断依据是腾讯“为村”全国微信公众号——“村号”实时公布的排名,从这个平台中可获知全国各个“为村”的总积分和指数。“为村”积分主要依靠“认证村民”在平台中的互动获得,比如“认证村民”在“赶集”版块中通过发布新帖、评论帖子获得积分。另外“认证村民”也可通过参与村务获得积分,比如参与“村务公开”评论、参加“投工投劳”、“投票评选”、“活动报名”等版块获得积分。“游客”即非“认证村民”进入“为村”平台,发帖和评论均不积分。截止2016年11月20日,F村“为村”总积分为272163,全国排名第一,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甘肃陇南康县巩坝村,该村总积分为80352。“为村指数”是衡量一个村庄移动互联网程度的重要指标,反映村庄的移动互联网普及程度和村民的移动互联网使用度。“为村指数”越高,就说明该村庄的移动互联网化程度越高。“为村指数”主要由3大指标决定,即认证村民数、村民积分总数、公众号关注数,同时“为村指数”会根据相关指数实时变动。(村号网,2016)截至2016年11月20日,F村“为村指数”亦居全国第一。

三、研究发现

社区认同是社区成员对社区共有价值和共同精神的认可和赞同,它是社区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社区连接的重要纽带。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公众参与是建构社区认同的重要因素。王铭铭(2004:149)指出:“社区认同的机制之一,就是通过共同参与仪式,造成村庄居民之间的合作,并通过仪式上的合作行为,界定社区内的人文关系。”但是我国基层社区的公众参与因受到政治体制、权力格局等多方因素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较好的途径和方式。而农民更是受到文化素质、基层政治体制的影响,很难做到公共参与。另外,由于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对乡村社区的影响,导致村民大量流向城市,从而使农村公共生活逐渐减少。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自由表达空间进一步扩大,同时为村民公共参与提供了契机和途径。下文将从移动互联网构建的公共生活复兴、承载乡村社区集体记忆、公共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这三个方面探讨村民网络公共参与对乡村社区认同的建构。

(一)移动互联网参与下的乡村社区公共生活复兴与认同建构

农村社区认同建立在社区居民的互动基础之上,没有一定的互动不可能形成社区认同。(吴理财,2011)集体化时代,国家以行政权力整合农民的公共生活,形成了机械团结,构建了政治权力主导的乡村社区认同。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农村生产方式由集体合作转变为家庭劳作,国家权力从乡村撤出后,乡村集体公共生活大幅减少,多种因素导致农民的公共精神逐渐缺失,同时也削弱了农民对于农村社区的认同。这一切都表明传统集体的保护、责任和控制已经弱化,建立在集体经济和政治控制基础上的农村社区或基层共同体走向衰落,而农民对于原有的集体及农村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已经淡化,乡村社区及共同体陷入信任与认同危机。如何重建乡村社区和共同体的信任和认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项继权,2009)

农村出现认同危机有多重原因,其中公共生活缺失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社会理论家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在《社群主义的说服力》一书中指出:“离开公共生活——没有利益交叉和不同形式的归属感,共同体的约束就是脆弱的、易受攻击的。”(菲利普·塞尔兹尼克,2009:20)曾经的乡村公共生活遍布于乡间地头,大树下、老墙根、村中央、水井等村落公共空间。这些空间曾是农民经常聚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议论家长

里短、探讨乡村政务、谋划乡村发展。但是随着农民外出打工,曾经以农业时间为主体时间的农民逐渐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时间。农民进行公共交往和生活的时间逐渐减少。农村公共生活的价值在于可以生产乡村规范、提供乡村公共精神。而当乡村公共生活缺失时,随之消失的是熟人社会的乡约民规以及农民对于乡土社会的认同感。为什么乡村公共空间的萎缩会导致社区认同的缺失呢?王斯福(1997)指出,由于参与者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具有平等性,因此在这里形成的公共意志或共同文化不是强行灌输的,而是被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的。那么,重构农村社区认同该从何处着手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不妨看看阎云翔对黑龙江下岬村私人生活变革原因和结果的描述。他认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农村的私人生活出现了转型,并由此出现了近年来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急剧发展,这种家庭文化之下的新型个人在最大限度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他们对社会或他人的道德感。(闫云翔,2009)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公共生活的缺失使得中国农民对乡村公共精神产生了轻视,同时逐渐对乡土文化失去了认同。

那么在移动传播时代,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移动媒介是否可以恢复农村的公共生活呢?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移动互联网为农民恢复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能。“为村”公共平台即是面向村民开放、可以让每个村民自由发表意见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村”公共平台按照移动网络论坛的理念设计,村民可以阅读、点赞、评论,可以在公共平台中进行发表意见、表达心情、参与政务等操作。如今,F村的“为村”平台已经成为了村民沟通交流、参与互动的重要空间。FYH在“为村”平台上说:“‘为村’已经成为了F村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手机已经成为了F村村民非常重要的信息接收媒介,在“为村”公共平台上发起的一项有关农民媒介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132人中有79%的村民认为手机已经成为了第一信息接收媒介。入户调查发现,晚上很多村民拿着手机围坐在一起上“为村”的现象非常普遍。F村因为“为村”公共平台的进入使得曾经衰落的公共生活再次复兴。而且基于移动传播的网络公共生活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媒介不仅没有减少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而且密切了村民之间的交往。FSX在访谈中说:

“为村”平台拉近了村里人的距离,大家因为“为村”联系更紧密了。F村有4个社,虽然大家都是一个村子,但是由于几个社之间隔着几座山,住得也有些远,大家平时忙着打工,见面机会少,还是有很多人不大熟悉。有了“为村”后,大家在“为村”上的交流多了,你给我点赞,我给你评论,熟人更熟了,不熟悉的人也熟悉起来了,以前走在路上不说话的人现在也开始说起话了。

如今,乡村正在进入媒介化社会,村民的沟通和交流对移动网络的依赖日渐增强。自F村开通“为村”公共平台以来,村民在现实空间的讨论围绕网络公共平台“议程设置”的话题逐渐增多。很多村民见面问候语变成了“你的‘为村’积分排名第几了”、“你最近发的那个(帖子)很有意思”、“我在‘为村’上看到你去重庆了”等等。在田野调查中类似的表述还很多,可以判断移动网络已经深深嵌入了F村村民的公共生活,而且网络公共空间的复兴带动了现实空间的互动。田野调查发现,一些村民不满足于仅仅在“为村”上的互动,而且还会在线下聚会讨论移动互联网使用技巧、“为村”平台发展、乡村发展等相关话题。F村的4个社中仅有一个社没有线下聚会讨论“为村”的场所,而其余3个社中都会有不定期的“为村”聚会。

正如梁漱溟(1990:303)所指出,中国的农民很散漫,他们必须“从分散往合作里走,以合作团体利用外部技术”。乡村公共生活的复兴孕育着乡村社区认同。这种公共生活不仅解决了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必要的互助、互惠的需要,而且也在其中找到了某种归属感,可以安放自己寂寞、漂泊的心

灵。(吴理财,2011)移动互联网“为村”公共平台构建的乡村网络公共空间借助农民的集体参与、阅读、批判,使得农民能够共同想象和感受事物,从而使得“情感共同体”成为可能。中国农民对于乡土的归属和依恋随着市场经济冲击而逐渐式微,对于乡土社会的认同逐渐减弱。移动互联网让失落的乡村社区再次回归,“为村”公共平台不仅让生活在乡村中的村民再次聚合在网络空间中,而且让分散在不同空间的村民再次聚合。“为村”公共平台成为了F村外出务工人员重要的沟通情感的网络空间。F村中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城市的几个务工人员是“为村”平台中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平台上分享在外地打工的生活感受,寄托对家乡的思念,参与讨论村务,“为村”连接了空间断裂的乡情。“为村”公共平台也让F村在外学子有了与家乡沟通的空间。FGR在“为村”公共平台上发帖表示:“毕业了,别人只有朋友圈、QQ空间,而我比他们多一个平台,那就是‘为村’。”移动互联网“为村”公共平台重构了F村的公共生活和交往,而且每个村民都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F村公共生活的复兴让村民找到了归属感,HCX在访谈中说: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随时随地打开“为村”,看看村里发生了什么事,看看其他人都去哪里了,做什么了。我觉得“为村”就像个大院儿,我发个帖子就有好多人给我点赞、评论,和我问东问西,我也乐意给他们回复,在这里有一种家的感觉。

F村村民因为公共交往的再次活跃,让他们觉得F村是一个有希望的村庄,虽然F村还没有获得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但是他们依然认可自己的村庄。关键报道人FBX在访谈中说:

我们村虽然没有获得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支持,但是我觉得我们村更美,我们有秀美的游龙山,我们有玉皇观,这些是自然美景和文化古迹。你可以在“为村”平台上经常看到村民们创作描写F村的诗词,从他们的文字中你可以看到这些村民对家乡的热爱。

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村民们通过网络公共交往,让曾经疏离的人际关系更为紧密,而且对家乡充满了热爱和认同。“为村”公共平台畅通了村民话语表达渠道,让村民参与公共生活成为了一种习惯,培育了合作、参与、责任、共享的社区文化,构建了新型的社区认同。

(二)移动互联网参与下的乡村社区集体记忆承载与认同建构

社区认同感的形成、社区意义的建构以及市民在空间政治博弈和社会改造过程中的主体性的生长是通过参与保护生活空间的文化特质和集体记忆的过程而实现的。(庄雅仲等,2000)乡村社区集体记忆是乡村的灵魂,维系了村民之间关系,是乡约民规的重要来源。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首次创建了“集体记忆”概念,哈布瓦赫(2002)指出,个体性的记忆由于必须使用人类社会的基本沟通工具——语言、逻辑以及概念,因此也就必然受到社会框架的结构性限制。哈布瓦赫尤其强调记忆的当下性,认为“往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过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因此记忆是现在、过去和未来。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与统治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周海燕,2014)乡村社区集体记忆的建构是决定乡村社区认同的重要因素。移动互联网“为村”平台嵌入乡村实现了乡村集体记忆建构主体的“大众转向”——由乡土精英转向了普通村民,以及实现了乡村集体记忆书写的“媒介转向”——由口口相传转向了网络承载。

“为村”公共平台是可以让每个村民参与表达的乡村社区媒体,而这也为拥有深厚历史传统文化的乡村建构社区集体记忆提供了空间。人们从社区中吸收和攫取文化特质以形成集体共识,就是透过传播机制,藉由符号的传递与互动而渐次形成。而每一个成员的活动,也经由转换成各类象征符号,传递和储存

在社区的集体记忆之中,并形成新的认同。(林福岳,2002)F村“为村”公共平台自开通以来,开展了收集“陇南神武团”^①文物和故事、回顾F村第一届民俗文化旅游节、展示F村传统艺术“霸王鞭”、寻找F村最美古曲传承人等活动,这些活动均得到了F村村民的积极参与。比如收集“陇南神武团”文物和故事活动中,村民们积极将自家珍藏的“陇南神武团”使用过的文书、兵器、碑刻纷纷通过“为村”公共平台进行了展示。据FSX说:

F村人都知道“陇南神武团”,大家也都知道有些人家中保存有当年留下的物件,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多少物件,而“为村”为大家展示这些物件提供了平台。你看那几天大家在平台上晒得欢的很。

这项由“为村”公共平台发起的活动引起了F村村民的广泛关注,而且也让大家更加熟悉了这段历史。历史让人有厚重感和荣誉感。F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西部乡村,曾经出现过当时名震甘肃陇南的农民抗暴运动,这让F村村民感到自豪。田野调查发现,这些村民大多都能说出一些片段,而且讲起这段历史时,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自豪感。在康县城关镇中心小学担任教导主任的F村村民FSQ说:

“为村”平台让这段历史重出水面,让村民们重温了这段历史。同时由于“为村”平台不仅仅是F村村民在关注,也有新华社、妇联、中国科协、康县政府部门等机构的人员以及其他外村人员关注,因此让村民感到自豪,因为外界关注,F村的历史让村民感到了荣耀。

认同是一种既涉及到自我感情,同时也涉及他者的心理状态。认同是在与他者的关注和比较中产生。F村村民都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因为“为村”公共平台的介入,使得F村村民觉得“陇南神武团”不再只是本村村民知晓的一段历史,外界也会关注F村的历史。“为村”公共平台成为了承载社区集体记忆的媒介和平台,让这一段具有历史感的社区集体记忆通过现代网络媒介得以呈现。“为村”公共平台的呈现构建了乡村以及乡村与外界相连的两个媒介场域,乡村内部的媒介场域呈现唤起了村民的集体记忆,作为外部展示的“为村”场域则让村民充满了想象,F村村民认为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通过移动互联网让外界更多人知道,加深了F村村民对于自己乡村社区的认同。

“为村”公共平台对历史传统展示重构了乡村集体记忆,强化了村民对于自我的认同以及社区的认同。贝斯特在《邻里东京》一书中论述了传统如何在社区认同中发挥作用,研究表明,社区内部看上去明显的持续性是传统主义的结果。贝斯特(2008:2)认为传统主义是“通过赋予当代现实有价值的历史内涵,对文化模式、文化符号和文化主题进行操纵、创造和重新组合,从而使当代社会获得合法性地位”。社区集体记忆可以凝聚人群,传统乡村社区集体记忆主要依靠口口相传,而如今移动互联网为乡村集体记忆提供了载体,让曾经的乡村历史有了表达空间。而且“为村”公共平台为每个村民提供了参与建构集体记忆的空间和渠道。正如涂尔干(1999)所指出的,通过仪式聚合起来的方式,通过符号的狂欢展示,人们相互表明他们是一个共同体。仪式不仅表达了这种认同,而且再造了这种认同。F村“为村”还发起了“回忆第一届民俗文化旅游节”活动。F村第一届民俗文化旅游节举行时,F村“为村”公共平台还没有开通,因此这项活动是村民回溯集体记忆的过程。“为村”发起的活动中,村民将自己拍摄的照片纷纷上传,康县羊皮

^①1931年,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土豪劣绅横行乡里,强取豪夺,苛捐杂税日趋繁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地处陇南山区的康县更是如此,连年混战及土豪劣绅欺压,使当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陇南神武团”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陇南神武团”屯兵康县F村,占据险要游龙山。“陇南神武团”主要宗旨是“劫富济贫”,因此,当地村民认同“陇南神武团”文化。

鼓、F村霸王鞭等承载历史传统文化的照片被村民在“为村”公共平台中展出。而这些具有历史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强化了村民对于F村的认同。FHX在访谈中说:

这些都是F村的历史传统文化,凤凰谷村、桂花山庄靠景色打造美丽乡村,我们村要靠传统文化打造特色小镇。

田野调查中,F村多数村民表示了对乡村历史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传统文化是否还会传承的担忧。而可以让每个村民参与建构集体记忆的“为村”公共平台显然在乡村社区认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让村民参与书写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而不是强制灌输,可以让村民有主人翁的感觉。文化存在于每个村民记忆中,让村民自己建构乡村历史本身就是对于村民主体性的确认,既展示了村民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同时也表现了对乡村社区的认同。

(三)移动互联网参与下的乡村社区文化共同建设与认同建构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现代文化、消费文化的侵蚀,加速了传统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公德的缺失,只注重个人权利,而忽视自己的义务及公众利益,最终沦为“无公德的个人”。关键报道人FBX说:

2000年后,F村的风气好像就产生了较大变化,大家的私心开始变重,关心集体的人越来越少,只看重自己得到多少钱,而不管公家和大家的事。2006年后,输电网线、绕城公路、输气管道经过F村时,村民都因为赔偿问题与政府进行了对峙,最终3次都以警察强制执行了事,最严重一次来了80多个警察。从那以后,F村的坏名声就传开了,F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烂村,导致不管什么项目都绕开F村。2013年底,村文书兼县人大代表FXJ就建了一个村微信群,取名“冯家大院”,让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改变人的思想,如何争取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如何改变村子现状。这3年,对F村来说意义重大,大家在微信群中发起话题,集体讨论、论辩是非,F村人的思想有了很大改变,这也给“为村”平台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为村”说白了就是要靠村民的积极参与,虽然无利可图,但是村民们觉得这是全村的事儿,大家都应该出力。

如今,F村“为村”公共平台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公益特质的自组织,这一自组织尤其在组织公共文化活以及倡导社区公共精神中发挥了关键作用。F村村民借助移动互联网“为村”公共平台共同建设乡村社区文化,构建了根植于当地实际情况、有益于整合村庄、有益于乡村发展的社区文化,强化了F村村民对社区的认同。

F村“为村”公共平台自开通以来,组织了“游龙山卫生治理”、“中秋慰问80岁以上老人”、“冬日暖阳·关爱留守儿童”、“树立F村模仿”(其中包括道德模范、公益参与模范、敬老孝顺模范)等活动。这些需要公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让村民逐渐感受到了社区公共精神的重要性,而这正是以前的F村所缺少的。关键报道人FBX说:

曾经的F村满地是垃圾,大家即便走过也不会捡起来,久而久之,这种习气逐渐成为了整个村子的风气。我们最开始在微信群里面指出了这个问题,并拍摄了垃圾满地的图片发在微信群中。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也感觉到这样做不对。“为村”公共平台开通后,我们组织了‘游龙山卫生治理’活动,倡导大家投工投劳,上村子后面的游龙山捡垃圾。由于之前在微信群里的铺垫做得好,那天过来捡垃圾来了很多人,一些在外地打工的人虽然不能回来,但是他们会告诉家中的父母,让他们上山捡垃圾。村里人逐渐意识到卫生问题是村子的公共问题,每个人都应该尽一些义务。

社区认同是社区成员与社区联结的一种重要机制,社区认同的强弱反映着这种联结的紧密或松弛程度。社区成员越是认同这个社区,意味着他对这个社区投入的情感越多,因此也越愿意为之付出,尽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吴理财,2011)如今F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比如通过网络众筹开展的“中秋慰问80岁以上老人”和“冬日暖阳·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中,两次众筹均在短短的1个小时之内筹集到了目标金额,时限过后很多村民还要求扩大筹集额度,并且主动要求参与现场关爱活动。这充分表明村民对F村产生了较强的社区认同感,而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又进一步强化了社区认同。F村“为村”公共平台在组织公共活动时,还会在“为村”公共平台上进行报道,表扬表现积极的村民,从而使F村形成了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文化氛围。

乡村文化建设是社区认同的关键要素,但是建设乡村文化不可简单从外部输入所谓先进文化。而应该发挥乡村的主体性,让村民成为建设乡村文化的主体。“为村”公共平台则为村民建构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可能。通过F村的文化实践表明,农民不仅可以自主掌握文化主导权,而且农民倡导的文化更“接地气”,更适宜农村,因此也会真正起到社区整合作用。经过3年微信群及5个月“为村”文化建设实践表明,F村村民的风气逐渐有了变化。“为村”公共平台的“村务公开”栏目中有这样一段话:

F村自从搞了“为村”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具体表现在:1.改变了一片人。村民的素质提高了(明辨是非的人多了,讲奉献的人多了,诚实孝顺的人多了,关注F村集体事业及发展命运的人多了,做好事、讲和谐的人多了)。2.凝聚了一股力。联系了乡情,化解了误会,团结了群众力量,使得F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好村。3.重塑了一个魂。原来出门的年轻人受外面花花世界的影响,乡情意识淡薄,我们通过大量的爱故乡专题宣传,村里历史老乡俗、乡贤文化教育、传统祈福神会、古曲儿、古节目挖掘表演等活动,使村民更爱家乡、迷恋家乡。现在每逢老节日便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西方的节日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记忆了。如今的F村,绝大部分都是爱党政、爱家乡、爱生活、知恩感恩的好村民。

曼纽尔·卡斯特(2003:3)指出,“认同是行动者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虽然认同也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其内化后,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通过线上民族志及田野调查发现,F村“为村”的文化倡导活动虽然是由F村“为村”团队^①发起,但是最终还是依靠F村“为村”平台“认证村民”的广泛参与。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为村”公共平台为乡村文化的建构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即依靠村民的参与创造适合乡村自身的社区文化,既注重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也并不拒绝外来文化。基于此路径建构的乡村文化更容易获得村民的认同。在访谈中FDX说:“为村是我们村的人讲我们自己的事儿,说我们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才喜欢看。”

“为村”作为F村的社区媒体,村民共同参与生产的内容与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契合、相融合,这种基于乡村本土文化建设的模式不仅适应了乡村发展,同时也得到了农民的认同,创造了一种共有精神。F

^①F村“为村”核心团队有9人,主要负责“为村”平台具体事务工作,比如发起讨论话题、发布网络调查问卷、发布村务公开及组织“为村”公益活动。另外,F村“为村”还组建了一个由42人组成的“为村”管理团队,这个团队是在核心团队基础上又增加了33人,包括F村在外打工人员、“为村”活跃分子等,以微信群方式组织管理。该团队在“为村”开通初期主要任务是拓展“认证村民”,目前具备了“为村”发展委员会特性,“为村”开展的重要活动均由管理团队共同商讨。

村村民通过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社区意识及情感,让F村村民产生了“我们村儿”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合作奉献的公共精神,从而建构了新型的乡村社区认同。

四、结论与讨论

认同主要源于发自内心的情感而不是外在压力。从这个角度讲,认同是建构的。移动互联网所具备的组织整合、承载文化、公众参与等特性,让乡村社区公共精神得以复兴,从而建构了新型的乡土社区认同。移动互联网“为村”公共平台为F村公共生活的复兴提供了媒介平台,让曾经失落的乡村社区公共生活再次复兴。乡村公共交往是形成乡村社区的基本条件,也是乡村社区精神复兴的根本。F村村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重新“部落化”、“社区化”,“社区回归”为村民的社区认同提供了基础。集体记忆是社区认同的基本根据,“为村”公共平台提供了村民可参与建构社区集体记忆的网络公共空间。参与让村民感到自我存在感,而历史的厚重更让村民感到乡土社区的重要性,认同在移动互联网承载的公共平台“为村”中得到体现。文化是乡土社区的纽带,“为村”公共平台作为具有文化引导功能的乡村自组织,发挥了文化共建共享作用,每个F村村民都可被认为是这一自组织成员,都可参与到乡土文化的建构中,参与让村民感到了乡土文化的意义,村民在乡土文化参与和感受中强化了对乡村社区的认同。

当然,由于农民文化水平、农村老龄化、移动终端普及等因素影响,F村中还有近四分之一村民依然同移动互联网处于“失联”状态。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移动互联网嵌入乡村后,村民的公共参与获得了恢复,网络公共参与连接了原子化的个体村民,让“共在”促进乡村社区整合;连接乡村与历史,让“共有”集体记忆成为社区认同基础;连接村民与文化,让“共化”促进社区认同。

参考文献

- 爱弥儿·涂尔干,1999,《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村号网,《为村冲锋队双周会》, <http://v.cunhao.net/app/blog/detail?wid=105&bid=1520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2016-09-20。
- 菲利普·塞尔兹尼克,2009,《社群主义的说服力》,马进、李清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斐迪南·滕尼斯,1999,《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梁漱溟,1990,《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林福岳,2002,《族群认同下的社区传播——以美浓反水库运动的论述为研究脉络》,台北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曼纽尔·卡斯特,2003,《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铭铭,2004,《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 王斯福,1997,《乡土社区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吴理财,2011,《农村社区认同与农民行为逻辑——对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思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 吴晓燕,2011,《从文化建设到社区认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9期。
- 西奥多·贝斯特,2008,《邻里东京》,国云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项继权,2009,《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谢治菊,2012,《村民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基于江苏和贵州农村的实证研究》,《理论与改革》第7期。

阎云翔,2009,《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赵霞、杨筱柏,2013,《当代中国乡村文化认同的理论外延与路径依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9期。

周海燕,2014,《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探讨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第9期。

庄雅仲等,2000,《小区运动与都市生活》,《社会学研究》第5期。

The Age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rs' Network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ommunity Identity ——Field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 F in Longnan of Gansu Province

NIU Yao-ho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rural community of our country is experiencing the crisis of identity. The cultur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building community identity, but how to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long been a common problem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Especially for the rural areas in western China, how to integrate rural communities is a very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face of the problems of increased mobility, hollowness and lack of public spirit. Mobile Internet has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edia particip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peasant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life in this field. With the help of the revival of the public life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cyberspac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in writing the rural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y identity.

Key word: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Identity; Mobile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刘谦)